

试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和谐文化思想

赵玉艳

(安徽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 以批判性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其思想文化遗产之所以至今还为人们所探讨和研究,不仅仅因为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传统,而且也暗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文化理念。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思维轨迹表明,其蕴含的和谐思想元素经历了从小到大、从隐蔽曲折到不断彰显的过程。该学派晚期代表人物认为,在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有机联系,生活世界与技术化的制度世界的相互沟通,以达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促进群际和谐、人际和谐和个体身心和谐。这些思想对与资本主义共处同一时代的社会主义来说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启迪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无裨益。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和谐思想;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11X(2014)05-0056-06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20世纪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以文化批判为手段,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综合的经济—意识形态分析,是早期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大众文化现象的理论,并且诚如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所言,他们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理论上的修补,以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然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也好,批判也好,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轨迹表明,他们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和未来命运的解释框架,因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片面化、教条化的理解都不会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得到发展,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哲学、斗争哲学,仅仅对暴力革命、社会冲突情有独钟,实质上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的。安启念教授认为,1848年前后,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经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他们在晚年转而主张无产阶级以合法斗争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实践的需要,把阶级冲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和谐相关的思想被遮蔽起来了。而随着当今局势的不断发展和趋于复杂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和谐相关的思想凸现了出来。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看法,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只讲斗争、冲突、暴力革命,与妥协、共存、和谐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解。^[1]

笔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不可能一点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有大量关于阶级对立、阶级冲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论述,而且也有许多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个方面之间相互和谐的思想,从法兰克福学派晚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的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来看,他试图说明,通过确立理性交往规则,确定交往行为规范是可以达到社会共识的,技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和交融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性实为“尚未完成之工程”,从而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理论上自洽的思想体系,法兰克福学派始终蕴含和谐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追求,只不过理论外现的方式、角度和强度不同,因而可以说,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阐释,但并未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统摄范围。法兰克福学派和谐文化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批判性、斗争性到建设性的转变,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蕴含着对人本主义的解读,蕴含着人们追求群际、人际和个人身心和谐的思想旨趣。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从早期的批判性到斗争性,最后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蕴含的和谐文化思想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

[收稿日期] 2013-05-04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和谐文化”(R01310004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赵玉艳(1977—),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和谐文化思想的发展轨迹

(一)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早期的批判性

20世纪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不再认为无产阶级具有强大的革命潜能,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整合的对象,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对人的工作与闲暇实施控制,而大众则是被预先规定在原子化、消极、被动、泯灭个性之类的位置上,逐渐失去了其基本的判断、理解和审美能力。法西斯主义通过宣传机器把个体变成群众,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个体变成大众。因此,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一直保持着严肃、冷峻的态度。他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被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人投机利用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阿多诺发现文化产业界缺乏内外批评,没有潜力。人们都被文化界的媒体广告操纵。流行文化使得现代人很被动;唾手可得的快乐让人变得易于满足,温良恭顺,忽视当下的经济环境。各个文化产品虽然看来有别,但实际上还是同一模子刻出来的。大众文化实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文化,暗含着资本家阶级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潜能的统治动机。换言之,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奴役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更不是为工人阶级的全面发展服务。被资本家培育出来的工人阶级虚假意识和虚假需求掩盖的是虚假的、表面的和谐。问题在于,阶级之间真正的和谐是可能的吗?霍克海默给出的答案是:“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必须让人类看到他的行为与其结果间的联系,看到他的特殊的存在和一般社会生活间的联系,看到他的日常谋划和他所承认的伟大思想间的联系。”^{[2]250}

霍克海默意图表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其价值在于为社会阶级和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沟通提供思想和行动的方法论。法兰克福学派在高度评价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地看到的是生产过程的异化,而没有注意到现时代同样被异化的消费过程。他们强调异化的“多面性和无所不在性”,异化表现在生产过程、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上,还表现在人和自然以及人和自身的关系之上。而“消费主义”世界则是全面异化的根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消费过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灵魂中,对人的批判意识和自我思维产生致命的影响。可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异化理论为武器,真正考量的是人与社会、自然及自身如何经由同化过程而达至和谐。

(二)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中期的斗争性

机械复制的艺术导致了传统艺术的消亡。本雅明认为工业化加速了大城市的形成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而导致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出现以后,文化产品能通过摄影技术、电影、唱片以及之后出现的电视、磁带、录像带、CD、VCD等大批量地生产。本雅明认为这种机械复制技术具有革命性和解放意义。但本雅明更倾向于对传统艺术的偏爱,认为大众传媒导致了传统艺术的消亡,导致了大众经验的匮乏,从而寻求一种新型的艺术根基,即政治。他说:“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3]94}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艺术不再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它也可以为大众所享受。与阿多诺相比,本雅明的思想逐渐摆脱了批判性,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社会,贴近大众的心理和需求去看待大众文化,其大众文化理论更是从精英主义走向平民化。

洛文塔尔认为“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进程所带来的个体的衰败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出现”^{[4]11}。他从文化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全面梳理了大众文化在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形成、发展和转型过程。认为大众是在历史中产生,有血有肉,是自己行为的主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认为现在的媒介更多是奴役和愚弄人性,与价值取向相分离,只给公众提供娱乐和消遣。认为不管大众文化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发生了怎样的功能转变,它在西方现代性形成之初都有着积极贡献,主要表现为大众文化培养起了资产阶级的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意识。

比较起来,阿多诺把自己的主体性经验渗透到研究中,把文化客体看作是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主要密码;洛文塔尔则把文化客体看做是破译社会进程的密码。阿多诺从批判电子媒介、视觉文化入手,对当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从而得出文化工业对个体伤害乃至造成毁灭性打击的结论。而洛文塔尔则以印刷媒介中的通俗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这就要求他要沉入到大众文化产生的初级阶段去考察。在对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上,阿多诺认为是无产阶级或是工人阶级大众,主体划分不清;洛文塔尔则确定是中产阶级。研究对象、历史语境和接受主体等的不同,造

成了洛文塔尔观点比起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执于一隅的偏激否定态度,似乎更加客观也更加中立。

在《单面人》一书中,马尔库塞以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研究内容,揭示出极权国家和社会以技术理性为大众文化控制的新手段,给人民提供了虚假的意识和需求,使人民逐渐丧失了反抗的意识。认为文化批判理论是以对科技异化引发的人在文化意识层面异化的一种批判,异化已经由科技异化渗透到各个日常生活层面。他侧重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考察异化,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认为克服异化,并不仅仅只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进行变革,还必须克服人的本质的歪曲,使人作为完整的人,全面占有和复归自己的社会本质,这才是社会的解放。^{[5]221}进而马尔库塞将理论研究指向了消费领域,这是对阿多诺主要从生产领域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有益补充和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反抗运动中,马尔库塞的大众文化观从继承、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观点走向了偏离和独创,即他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阿多诺的悲观思想,而从本雅明的理论中汲取了灵感和资源,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发现了大众文化的革命功能。与阿多诺相比,他毕竟看到了大众文化更为丰富复杂的作用。同时,他的文化立场和价值的位移,从造反青年的代言人到站在亚文化群的立场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个体的民间立场。

马尔库塞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理论,认为文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对人们造成的最大影响是对人性和人的本能(尤其是生的本能和爱欲)的“压抑”,现代社会的最大病症在于人的心理本能结构遭到了破坏。他提出了“生物学基础”这一概念,认为人的本能的完整性以前一直被有效地压制着以适应阶级社会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革命,把人们从“剩余压抑”中“解放”出来,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从而达到群际和谐、人际和谐和个人身心和谐。

(三)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的建设性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未能认真对待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并拒绝用它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沉醉于工具理性批判之中,拘泥于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而没有对这个复杂的现实社会进行经验分析。因而,这种批判对社会经验研究的贡献微乎其微。第二,它未能扬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仍然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力量,不能把握理性的真正意义。第三,它未能认真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因而不能客观评价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福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直接结果就是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在继承前人工具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是以“规范”的角度,从社会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来解决文化领域中剩余价值的问题。

哈贝马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大众文化在现代性发生之初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转型,公众在交往网络中形成的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意识变成了消费意识。而市场则是造成这种转型的“无形的手”。文化商品呈现出商业化的特点,变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导致了文化自身贴合大众。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技术至上主义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理念。对于文化领域而言就是,不仅在文化的生产和销售中使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而且文化的内容选择和传播也都自动地投入科技的怀抱。相对于前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而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至上主义导致了文化的贫瘠。这种文化的贫瘠会对整个生活世界造成广泛的影响,由此他提出了最具代表性、最著名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一种理性的视域内,人们才能对抗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吞噬,在平等的交往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与意见一致,缔造没有暴力没有压制,自由而和谐的共同生活。^[6]

他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病症并不仅仅局限在系统(体系和制度),而是在“生活世界”范围内,是“生活世界”受“系统”作用媒介的侵蚀,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而且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是“合法性”危机;他认为合理的社会形态不能由物质生产领域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即由“劳动”过程的发展和变化产生,而是人们在“交往行动”中通过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尤其是道德文化知识,形成新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在交往中达成对合理行为规范的认同,这样才能最终创建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

建立真正“合理化”的社会应该是系统结构领域、文化道德领域以及生活世界领域的全面合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道德和艺术可以相互交往”^{[7]167}。在他的心目中,合理社会就是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平等、自由、公正、民主的社会。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蕴含的和谐文化思想

(一)重视大众文化的平民化、人文性

法兰克福学派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马尔库塞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对人性的关怀。在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他对单向度人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强调人的自主性、人的价值与尊严以及通过人的爱欲的解放等,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全面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表面上繁荣却不是真正

的幸福,人们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不断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具有虚假性,而人们所获得的也是虚假的幸福。新的技术理性使人们丧失了反抗的欲望与否定能力而被社会整合和控制,人的真实需求被压制,从而扼杀了人们可以创造真正的幸福和解放的潜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性几乎丧失殆尽,人沉沦为丧失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的抽象的劳动者,他们和自己劳动的对象相分离,被迫把自己当作商品出售”^{[8]96}。

(二)注重大众性与艺术性并举

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文化应是批判性的、艺术性的,是精英的、高雅的,他强烈指责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性。他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大众文化时是以获得较高利润为目的,这势必使大众文化产品缺乏深度。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它本身,艺术本身的价值在于借助审美形式去揭示现实生活中压抑和禁锢人的制度体系,它的解放价值在于与现实疏离及异化的程度。马尔库塞说:“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至跳舞,来同物化作斗争。忘却过去的苦难和快乐,就可把人生从压抑人的现实原则中提升出来”^{[9]237}。马尔库塞把艺术看做是构造现实、改变生活方式的一种力量,认为艺术会改变他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和功能,“他将成为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的生产力”^{[9]54}。他认为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这样的作品才具有艺术价值,才能具有普遍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才能为大众所接受。

(三)力图建构规范、合理、有序的交往行为框架

哈贝马斯认为要实现人性的真正解放,建立和睦、和谐的人际社会关系,必须建立一个规范的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社会。所谓“交往合理化”,其核心就是让对话主体之间进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求得相互“谅解”。^{[10]419-420}他认为,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亲善,必须改变舆论结构,实现自由对话、自由交往,达到“文化体系的合理化”,进而达到“社会的合理化”,因为“社会的合理化就是社会运用文化上现成的合理性结构来改造它的基础结构”。^{[11]76}

哈贝马斯说:“在理解的职能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文化知识的传统和更新;在行动合作化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社会统一和联合的形成;最后在社会化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文化、社会和个人作为生活世界的结构因素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的这些过程相适应。”^{[12]188}从而实现生活世界与技术世界的一体化,文化作为沟通两者的桥梁,最终使得感性世界、理性世界与文化三者形成通达。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缺乏规范,只是一种哲学理论上的推演;但他认可洛文塔尔对于大众文化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判断,并论证了大众文化对于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他要夯实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提供正常的社会评价标准,并试图用交往理性建构出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规范基础。

(四)追求群际和谐、人际和谐和个人身心和谐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是最早分析消费主义、广告、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如何把个人整合进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它们来巩固其制度,从而对消费社会进行分析的批判理论家之一。马尔库塞在《单向度人》中提出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著名论断,在他看来,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以及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消费和爱爱仇仇的需要,都属于虚假需要,而真正的需要应该是指自由、爱欲、解放、审美等等的需要。^{[13]4-5}马尔库塞在晚年走向了审美之维,更是诠释了他所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群际之间,人际之间和个人身心之间的和谐发展。

(五)刻划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未来图景

马尔库塞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指出,肯定性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即高雅文化。在肯定性文化中,艺术在为人制造美的同时也压抑了人反抗的冲动^[8]。虽然马尔库塞对高雅文化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高雅文化的存在价值。马尔库塞在否定高雅文化的同时实际上是对大众文化的褒扬;当审美理想作为高雅文化实现的途径时,大众文化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而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相融合时,他们就成了马尔库塞解放爱欲、呼唤感性,审美之维的革命大旗。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马尔库塞思想中已产生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和谐发展的萌芽。

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后民族结构”,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种跨国组织、跨国公司和跨国文化机构等的建立,要求创立一种扬弃民族国家的新的世界秩序。而后民族格局的重点在于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14]156-157}哈贝马斯想通过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发展文化公共领域,进而达到各种多元文化的和谐。

三、法兰克福学派和谐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的启迪

法兰克福学派的和谐文化思想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得到鲜明而强烈的展现,虽然他的理论有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思想倾向而饱受意识形态的纷争,但它客观上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了自己的一剂“药方”,虽然他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具有浓厚的

“乌托邦”色彩,但他对生活世界和制度世界的分裂和对立状态的关切,并试图规范和重构社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促进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勇气和胆识是为人称道的。同时也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与资本主义制度将会长期共处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也有启迪意义。在当今中国,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如何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宏大课题。中国的文化长期以来以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为主,而大众文化自198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其发展速度迅猛,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相抗衡,形成了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等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紧密联系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利用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创造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培育共同理想,倡导和谐精神,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词义上讲,“和”就是和睦,和衷共济;“谐”就是相合,要顺和、协调,避免抵触和冲突。其内容就是以和谐理念为核心,并将追求和谐作为思想核心和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文化形式,并随着在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去倡导、实施,既包括和谐的思想观念,又建立相应价值体系,既建立起行为规范、制度体制,又衍射出文化产业、产品,以多种存在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反映和谐社会的要求和特点。和谐文化是人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关于和谐的认识情感和态度,展示的是人民之间的团结共进,社会的科学稳定发展,制度的科学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融洽和睦等。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及市场规则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渗透,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凸显,混乱的价值取向,低俗的文化因子败坏着社会风气,以暴力、色情为主导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整个文化市场,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挖掘着大众内心的灰暗,在罪恶之门里追逐着市场和利润。利益取代了责任,大众文化在商品化浪潮中逐渐缺失了自身的文化品格。这里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是:

其一是大众文化对主导文化的影响。我国现阶段的主导文化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根本宗旨是以崇高精神为追求指向,弘扬积极向上、理想的、英雄主义的高尚精神,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15]232}。在当今世界文化大发展、多元化的背景下,主导文化的影响力、整合力在不断的下降,其在价值取向上与大众文化的世俗化取向差距甚远。例如,在一些动画片、电视剧、电影和通俗文学中出现的所谓的英雄人物、超人、救世主等,无非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是为了迎合大众的价值取向、文化品位,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其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知识精英角色的转型,精英文化领域逐渐地向大众文化领域过渡。这一方面有利于精英文化本身的扩展,有利于和社会大众的直接结合,但经过包装、再生产后的精英文化逐渐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取向,而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员。其次,大众文化以商业化、娱乐化、大众化为特点,占据了市场的极大份额。进而将精英文化挤向市场的边缘。再次,审美情趣的冲突。现代传媒宣扬的追求时尚、名利、享乐的价值观念,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使大众逐渐丧失了精英文化所倡导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实际利益的不适当的追逐,使所有的人对浪漫的诗性情怀和乌托邦一点情感联系都不保持……那么,崇高、神圣、庄严、正义、功德就将失去对于秩序的权威性。”^{[16]55}

其三是主导文化的现实关怀和涵摄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主导文化经过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共生的局面。面对传播、挑战,通过政府主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各种经济、行政、立法等手段,对大众文化进行有效的调控;大力实施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产业的重心落实到文化上,尽可能地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主导性和效能性。

因此,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文内涵,消除异化,促进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倡导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求同共生,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构建三种文化的多元共存的有序结构,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培育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

1. 弘扬和倡导文化的人文内涵

中共十六大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把原来的文化事业明确区分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和营利性质的文化产业,公益事业承担国家使命和为国家意志服务,文化产业则面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和流通,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17]23}。中国的文化产业确实发展迅猛,并且为大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充实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以市场经济为内在驱动力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从一开始

的策划、生产到传播都带有强烈的市场逻辑。许多大众文化产品被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投入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市场价值被当作首要目的,而文化本身的终极价值或人文关怀则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文化与经济的联姻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化的市场化本身是对文化多元化的一种解放,可是当今文化的过度市场化却又制造了新的压抑,在这种压抑下,无论文化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在市场的操纵之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偏重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建设,而缺乏对文化人文内涵的关注。现实中不少人过度强调文化产业的利益而使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有片面性。当前,我国政府反复强调“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如果要推动文化产业的和谐发展,显然要认真避免在当前的文化发展中出现过度经济化的倾向,而应该多多弘扬和倡导文化自身丰富的内涵和人文价值。

2.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求同共生,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英国哲学家斯诺指出,“科学与文化的分裂,这种倾向似乎在加强而不在削弱……文化分裂之类的情况一旦形成,所有的社会力量不是力求使之缓和,而是越来越加强。”^[18]当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两种文化的分裂的现象是愈演愈烈,主要表现在重理轻文,注重科学技术的主体地位而轻视人文文化。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就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高等教育的专业化使年轻的大学生在学期间所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开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开的教育。“在这两极之间是一条充满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是敌意和不喜欢,但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相互之间存有偏见。态度是如此的的不同,即使在感情层面也找不到共同点。”^[19]分裂使得受教育者知识结构不合理,知识面狭窄,人文素质低下,从而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缺乏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等。斯诺认为,专业化的教育,虽然为社会提供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但这些人才却不是全面的人才,在国家和社会的进程中,他们的观点、创造性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全面的发展。所以,这就需要两种文化加强沟通和融合,这是必须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其目标旨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3. 三种文化的多元共存,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全球多元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下,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复杂化,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发达,文化的更新越来越迅速,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处理好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关系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关系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

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不同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自由和民主”,笔者认为:首先,要建立一个规范的文化市场,充分发挥主导文化的引领、推动和制约的作用,保障大众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次,要建立艺术保护机制,尤其加强对精英文化的保护措施,从而促进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最后,加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渗透,明确各种文化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

[参 考 文 献]

- [1] 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3):81-90.
- [2]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3]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 [4] LOWENTHAL 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1.
- [5] 欧力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6] 孟威.“合理化”的意义与实现——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述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2).
- [7] 赵海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
- [8] 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M]//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9]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0] 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11] 哈贝马斯.我和法兰克福[M].张继武摘译.哲学译丛,1984(1).
- [1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1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 Beacon Press, 1991.
- [14] 曹卫东.思想的他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5] 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6] 孟繁华.众神狂欢[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77.
- [17] 文化发展论坛2005年度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 [18] [英]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
- [19] [英]C·P·斯诺.两种文化[M].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